



古老的
乡土，
复苏的
乡土，
孕育出今日
一颗躁动
不安的
灵魂

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

胡潇主编

湖南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世纪的回顾与断想	(1)
一 久久萦怀的情结	(2)
1. 三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	(2)
2. 乡土中国的深化研究	(4)
3. 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	(6)
二 继往开新的历史跃迁	(11)
1. 乡村生产力的伟大解放	(13)
2. 新文明的“启辉”	(18)
三 时代风采的素描	(25)
1. 历史的机遇	(25)
2. 基本的意旨	(34)
第二章 经济的改革与崛起	(41)
一 农业的环境	(41)
1. 生态环境	(41)
2. 人口环境	(44)
3. 经济环境	(47)
二 改革与生机	(51)
1. 改革前的乡村经济	(51)
2. 改革的契机与突破	(58)
3. “大承包”带来的三大转变	(60)
三 经济在改革中的崛起	(64)
1. 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	(64)
2. 各具特色的经济模式	(66)
3. 物质技术的变革	(70)
4. 由“温饱”向“小康”过渡	(71)

四 危机与对策	(72)
1. 并非危言耸听	(72)
2. 出路和对策	(76)
第三章 社会的架构与漂移	(80)
一 乡村的区位生态	(80)
二 社会的外观与机理	(88)
三 血缘·地缘·文化圈	(94)
1. 乡村社会中的血缘	(94)
2. 乡村社会中的地缘	(101)
3. 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圈	(103)
四 结构的变迁	(111)
1. 群体本位趋向个体自立	(111)
2. 角色他赋趋向角色自致	(113)
3. “同分同构”趋向“同分异构”	(114)
4. 上下排列趋向平行建构	(116)
第四章 心理的回应与重组	(120)
一 传统生活的心理显示	(120)
1. 农耕心理	(120)
2. 村落意识	(123)
3. 乡土精神	(127)
二 乡村变革的心理回应	(134)
1. 社会教化的力量增长	(134)
2. 文化优势的主体转换	(137)
3. 外控与自控的变奏	(143)
4. 顺应与同化的互彰	(148)
三 乡土文化的心理重构	(152)
1.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融通	(153)
2. 习俗与时尚的位移	(156)
3. 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升沉	(159)
第五章 文化建设与定位	(165)
一 一幅不大协调的油画	(165)

1. 三种取向	(165)
2. 分布态势	(171)
二 从“物”的变革开始突破	(178)
1. “离土不离乡”	(178)
2. 规模经营与新型农民的成长	(181)
3. 新文化冲击波的“震中”	(182)
4. 商品经济的双重效应	(183)
三 振荡心灵的创造	(186)
1. “硬件”建设	(186)
2. 在娱乐中自我提高	(188)
3. 灌输与引导	(190)
四 机遇与困难之间的进取	(195)
1. 原则	(195)
2. 困难	(197)
3. 机遇	(198)
4. 模式	(200)
第六章 生活方式的选择	(203)
一 生活基础的变构	(203)
1. 收入水平的波动	(204)
2. 收入构成的调整	(206)
3. 落差的喜与忧	(209)
二 生活消费的走向	(212)
1. 处在潮头上的消费	(214)
2. 从自给走向他给	(218)
3. 从生存走向享乐和发展	(219)
4. 消费走向的因果与演化	(223)
三 生活时间的分割	(227)
1. 乡民的作息	(228)
2. 闲暇时间的消费	(232)
3. 个性化的业余生活	(234)
四 生活交往的转机	(236)

1. 交往时空的伸缩	(237)
2. 交往对象的变换	(239)
3. 交往内容的更新	(242)
4. 交往原则的调整	(243)
五 生活目标的寻绎	(244)
六 生活方式的发展	(248)
第七章 家庭内的躁动	(250)
一 家庭的规模和结构	(251)
二 家庭功能的变化	(256)
1. 生产功能	(256)
2. 生育功能	(258)
3. 消费功能	(259)
4. 教育功能	(262)
三 家庭的人伦关系	(265)
1. 父子关系	(265)
2. 男女夫妻关系	(266)
3. 婚恋关系	(269)
四 家庭文化及其变迁	(274)
第八章 黄土地上的追求	(281)
一 古老的土地梦	(281)
二 土地新篇	(291)
三 土地之外的求索	(301)
第九章 道德天平的倾斜	(307)
一 “礼治”的奇迹	(307)
二 乡民的理想人格	(313)
1. 敬长尊亲的孝悌思想	(314)
2. 克己尽职的责任意识	(316)
3. 知恩图报的利益观念	(318)
4. 勤劳节俭的生活态度	(320)
5. 诚实无欺的信誉原则	(321)

6.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323)
7.求中致和的处世精神	(325)
三 道德的调整	(327)
1.道德调节的多元化	(327)
2.新的行为规范	(329)
第十章 乡土理性的超越	(335)
一 传统的思维模式	(335)
1.以经验为主的思维框架	(336)
2.平直的思维视野	(340)
3.稳定与中和的价值逻辑	(344)
二 变革与超越	(347)
1.思维框架的更新	(347)
2.思维空间的方位转移	(349)
3.思维价值逻辑的置换	(351)
4.思维方法的精确化	(353)
第十一章 信仰王国的奇观	(356)
一 “菩萨”的打倒与复起	(356)
二 神魂幽荡的世界	(370)
1.天地崇拜	(372)
2.祖先崇拜	(373)
3.圣贤忠烈的神化崇拜	(373)
4.行业祖师崇拜	(374)
5.“家堂神”崇拜	(375)
6.前兆迷信	(376)
7.术数迷信	(378)
8.诸种禁忌	(378)
9.巫信	(380)
三 乡民信仰的文化特征	(382)
1.信仰的自发性	(383)
2.信仰的功利性	(385)
3.信仰的伦理性	(389)

4.信仰的多元性	(392)
5.信仰的残余性	(398)
第十二章 绿色世界的梦幻	(406)
一 挂在嘴巴上的文学	(406)
二 泥土里长出来的艺术	(415)
1.乡村音乐	(415)
(1) 劳动号子	(416)
(2) 山歌	(417)
(3) 小调	(418)
2.乡村舞蹈	(420)
3.乡村美术	(424)
(1) 年画	(425)
(2) 剪纸	(427)
三 乡民的情韵	(432)
1.俚语乡音的文化蕴含	(432)
(1) 乡土生活的积极认同	(432)
(2) 农耕文化的历史回响	(435)
(3) 美好理想的执著追求	(439)
(4) 乡情民俗的真实纪录	(444)
2.悠悠乡情的审美方式	(451)
(1) 审美的位置与距离	(451)
(2) 真与善的统一	(455)
(3) 象征和比喻的结合	(459)
四 迭起的新潮	(464)
第十三章 田野上的希望	(481)
一 由来已久的危机	(481)
1.乡村教育八十年	(481)
2.田野上的呼唤	(484)
二 新模式的生成	(486)
1.导向的更新	(486)
2.权力的下放	(487)

3.多渠道集资	(488)
4.新模式的成型	(491)
三 新模式的效应	(488)
1.体力、智力与素质	(498)
2.教育发展与产业调整	(499)
3.资源开发的技术准备	(500)
4.乡民致富的机遇	(500)
5.基层干部知识化	(501)
四 新模式面临的考验	(502)
1.基础尚不稳固	(502)
2.职业教育面临滑坡	(503)
3.师资问题严重	(505)
4.“我们没有钱!”	(507)
5.“童工”的困扰	(509)
五 来自世俗的阴影	(512)
1.大拇指和小拇指	(512)
2.你为什么读大学	(513)
3.新的“读书无用论”	(515)
4.王家堡现象的背后	(517)
后记	(520)

第一章

世纪的回顾与断想

历史的年轮进入了本世纪末叶的最后几圈。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急速变迁的年代。

改革开放10多年来，由于决定社会面貌的物质生产在向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状况进一步转变，因而也出现了乡土文明向都市文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相应转变的情景。中国是一个有8亿多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是以乡土社会为主体的社会。社会的一切重大变化，无不牵动着乡村的变化，无不体现在乡村的变化之中，最后也无不需要经过乡村的变化去实现。因此，我们要把握中国历史的进程，把握民族文明的时代脉搏，不能不睁开眼睛认真关注乡村的情形。但是，不知道原因何在，民族的故园，古老而广袤的乡村，许多年来却常常只是出现在文学家的眼界里，而在社会科学家的视野外。至少在文化研究的层面上是这样。也往往是因为对乡村研究的忽略，我们的决策发生了许多偏差。与此同时，我们还紧迫地感受到，由于城市文明对乡村文化的渗透和改造，许多昔时长留乡里的文化在被人遗弃，在败落，在丧失，在毁灭，若不去发掘并站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进行必要的研究，委实说对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趋势，是很难有深刻把握的。基于这样一些复杂的考虑，我们便踏上了前人已经开拓的认识之路，想对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在文化上作一些自己的观察和探究。

一 久久萦怀的情结

我们批评自己所在的社会科学界对乡村关注不够，旨在说，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极端重要性，与我们对它的关注程度和所做的努力，是极不相称的。当今中国学科如林，却极难见到几门专门研究乡村的学问。但这绝不是说，乡土中国的问题不曾被人重视过。事实上，本世纪以来，那些企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们，总是把乡村问题一再提到了自己研究的台面上，并且作出了勇敢的尝试。他们与乡村问题，结下了久解不开的情结。

1. 三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

清末以至国民党统治期间，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敌人入侵，兵祸连年，中国的乡村坏到了极处，广大乡民一次又一次地陷进破产、饥荒和战乱的灾难之中。面对乡土中国的衰败，一批具有爱国热情的文人、学士持续发起了振兴乡村的运动。首倡者是河北定县的米迪刚、米鉴三。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他们就提出了要努力振兴农村。1904年，米鉴三留学日本归来，在其家乡定县翟城村成立“爱国宣讲会”，宣传爱国思想，传播新文化，提倡新的乡风。次年，他们成立“改良风俗会”，对早婚、迷信、妇女裹足等陈规陋俗发起了批判，倡导乡民互助，举办乡村储蓄业，凿井平路，开发农业。他们的改革试验，引起了社会的纷纷议论，支持者少，指责者多，只好中途停止。然而，他们的勇敢尝试，却给许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进步分子，更深切地认识到了乡村的危机，继续大造舆论，推行乡村的改革与建设运动。并且，他们各有自己的宗旨。

以教育家陶行知为首的乡村生活改造派，主张从教育入手，改革教育，开启民智，训练乡民，改造乡村。行知先生组织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7年在南京创设乡村建设学村，以教育为中心，兴办卫生、商业、消防、体育等项事业。这种寓教于

生活，以教育重建乡村的运动做了三年，但无多少成效。1932年，陶先生又组织了乡村改造社，企图通过科学、文化的传播，通过对乡民的组织和训练，去改造乡村，但最终的结果仍然象前次一样，未获成功。

以平民教育家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推动者，属于平民教育派。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存在着“愚、贫、弱、私”四大病端，这是民智未开、文化失调的结果。因此，必须针对这四大问题，从提高农民的文化入手，去进行文艺、生产、卫生和生计四大方面的教育，以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治愈“四病”。基于这种善良愿望和构想，1924年，晏阳初在保定22个县推行平民教育，并于1926年至1936年在定县创办了平民教育试验室。但由于他们的认识和实践脱离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乡村运动又一次宣告失败。

以文化人梁漱溟为代表的是乡村建设派。他对乡土中国的文化及乡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考察和研究，应该说还是下了相当功夫的。他认为，中国为乡村国家，应以乡村为根基，以乡村为主体，以乡村为本，以农业引发工业，而繁荣都市。他满腔热情地发出了“下农村”、“作农人”的呐喊。1931年6月，山东省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亲任院长，并在邹平县开辟以乡农学校为中心的组织和建设乡村社会的试验区。但迫于内忧外患，他们的努力最终也失败了。

乡村建设运动中，除了以上这三大派别外，还有很多对它进行研究与宣传的小团体，总计达1000余个。与此同时，各种研究和宣传乡村建设的出版物也大批涌现，如北平的《乡土杂志》、《乡村问题周刊》，山东的《乡村建设》，湖北的《乡村建设月刊》，四川的《乡村建设季刊》，浙江的《乡村建设通讯》等等。人们多从兴办教育，发展集镇，建设农田水利，绿化和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等实际工作出发，去推进中国乡村的改造和建设。其中许多主张和愿望，不能说没有良好的出发点和合理的因素，但因国家当时正

处于危难中，一切与民族危机、经济崩溃、战祸连年这些生死攸关问题相脱离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的企图与努力，都无法找到现实的依托和基础而只能归于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历史上热闹了30多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民族矛盾的激化和上升，而归于无声无息了。

2. 乡土中国的深化研究

乡村建设运动告一段落，但它们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在实践上，乡村运动的种种试验，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建设，乃至合作化和今天的农村建设，都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而在认识和研究方面，乡村建设则推动了许多有志之士对中国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调查与探讨。处于广泛宣传和推行乡村建设的时期，人们为了论证自己的意见，宣传自己的方案，广泛组织和发动群众，不得不对当时乡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种种分析、研究。其间，一些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提出：为了推动乡村的建设，需要对社会作广泛深入的调查，抓住一镇一村，把它们作为一个个小社会去进行考察和研究，以资指导改革和建设乡村之用。许多社会学家异常积极地投入了乡村调查研究的工作。而建树最多的，则首推费孝通先生。

费先生对中国乡村的关注和研究，历时数十年，成果卓著。他早年的努力，在时间上与乡村运动有些重合，在内容上也涉及了乡村运动接触到了的某些东西，因而认识上多方面地深化了乡村运动提到的一些问题。但两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为费孝通先生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是开始于自己对少数民族问题的探讨，并未止于乡村运动的终结，而且在方法上也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学视角。

1935年夏，费先生曾偕同前妻王同惠去广西瑶山调查瑶民社会状况，并写成题为《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考察报告，开始了他研究乡土中国的第一步。次年，他回自己的家乡调查农村的经济、社会状况，并于同年秋到美国，写成《江村经济》一书，1936年在

英国出版。1938年，他从英国返回，到云南乡村继续作实地调查，写出《禄田农村》一书。这以后直至1942年，他在云南大学组织了一个有10多人参加的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机构——“魁阁”，他的同人们还先后写出了《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对乡村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1943年费先生去美国，先后将以上成果改写成两部英文著作出版。他自己认为，以上近10年的实地考察、研究工作，是他研究中国农村的第一期工作。从美国回来后，他进行了研究乡土中国的第二期工作，即对乡土中国进行“社会结构的分析，偏于通论性质，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①。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他的《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两部著作中。

我们想单独谈谈作为本书出题立意之参考的《乡土中国》一书。该书是费孝通先生依据他讲授“乡村社会学”的材料，整理成14篇文章陆续发表在《世纪评论》上，然后汇编成书的。我们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篇篇幅不大但蕴含丰富的著作，大体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乡土中国》作为费孝通先生在解放前考察、研究农村社会的科学记录，为我们认识以往旧的中国农村提供了某种历史的参照物。它告诉我们40多年前传统的乡村社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概状，因而有利于我们认识乡村今日的发展、变化以及今后将如何走向等问题。并且，由于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是一种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从新旧历史的交替来说，这种转变的幅度之大和改造之深，形成了“一天等于20年”的非常时期，社会的进步完全超过了寻常时期内所能达到的程度。因而成书于解放前夕的《乡土中国》，也能有助于我们从乡村的原型推断它的转化，进而从世纪之末的今天推断新世纪即至的明天。

其次，《乡土中国》的研究对象，“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

^①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0页。

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东西^①，这些东西不是社会的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的“文化格式”^②。费孝通先生在这里已经悄悄地转换了他在以往主要偏重于社会的组织和经济的视角，而着力从乡土文化、乡土精神、乡土传统等方面去讨论中国的乡村或乡村化的中国的社会特征。从这种视角研究乡村的著作，实不多见。因此，它对于我们从文化上对比研究今天的乡村、预测今后的乡村变化，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尽管我们的视野更宽、更具体，但费先生所努力揭示的乡土精神，却多方面地启发了我们。

再次，它是费孝通先生多年考察、研究乡村情况的思想结晶。如他自己说的，这个属于他研究中国乡村的第二期工作的成果，完全是建立在对乡村长期的实地调查、个别研究的基础上的。它既有强烈的现实感，但又不是具体社会的描写和报告。反过来，它既有某种描写和报告，但又不止于这些描写和报告^③，而是把对社会的事实考察和理论研究融为一体，是据实的理论描写和理论报告。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方法论的启示：在对乡村进行富有典型意义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对现代乡土中国的状况作一些理性分析和与事实报告相结合的说明，把费先生曾经分开去做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工作结合到同一项研究活动中去。

我们着重提到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并不是认为其他人的著作及费先生的其他著作对我们研究乡土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就无足轻重了。我们在前人对中国乡村的缓缓求索中，比较重视《乡土中国》，只是缘于上面举出的几方面的原因。

3. 共产党人的艰苦探索

中国是乡土的中国，中国问题首先是农村问题。本世纪以来，

① 《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90页。

② 《乡土中国》，第97页。

③ 原文为：“这本小册子和我所写的《江村经济》、《禄田农村》等调查报告性质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

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首先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农村。也正因为农村问题，是一个中国问题，所以，离开了对全中国问题的解决，离开了致力于解决全中国问题的共产党人的努力，孤立地研究和解决农村问题的其他办法和其他力量，都是不能成功的。这样，也就使周密地调查研究和系统地解决乡村的问题、推进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乡村建设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其中，对农村问题关注最早、调查最多、认识最深、工作最自觉的，应该首推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他对中国及其乡村的长期观察、研究和了解，最先认清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道理。因此，他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可以说，在思想认识和战略制定方面，是得益于对农村情况的深刻把握，进而得益于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

对农村的调查研究，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活动。根据有关材料统计，毛泽东一生亲自参与或直接组织的重大调查活动，大约有140余次。其中，有50多次是集中调查农村问题的。可见，农村问题在毛泽东的胸怀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青年时期，抱定改造中国这个革命理想的毛泽东，就立志要读社会的无字之书，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将思想“引入实际去研究事实和真理。”^①基于此，他曾多次深入农村广泛调查。1917年7月，他邀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游学”湖南宁乡、益阳、安乡、沅江、长沙五县农村，了解各地的社会状况和农民疾苦。同年12月，毛泽东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一带农村访贫问苦。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到湖南益阳、沅江、岳阳、汉寿等县农村调查，了解农民，体察社会，深刻认识变革农村、改造中国之必需。1920年4月，毛泽东在从北京南下上海途中，去泰安、曲

^① 《健学会成立及进行》，载《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阜等地农村调查。1921年初夏，毛泽东再次沿洞庭湖边到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阴等县的农村作调查，进一步研究农村的各种问题。

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农村问题的调查更为自觉，并且紧密地结合各个时期的斗争实践进行工作。1926年5月，他在广州农运讲习所主持工作，按地区把学员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列出36项农村调查研究问题，引导和组织学员系统研究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9月，毛泽东在上海负责中央农运工作，对江浙两省的农运情况，特别是崇明、江阴、无锡、丹阳、青浦、泰兴、泰县、慈溪等地的农村情况进行广泛的收集，发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一文。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运情况，向中央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立足于对封建制度下中国乡村的深刻了解和批判，对革命农民从政治经济上反压迫，从思想文化上反奴役的斗争，给予了坚决的支持。3月，他到武昌中央农讲所工作，又多次组织学员到市郊区、石咀、咸宁、通山等地农村调查。11月，他对江西的永新、宁冈两县农村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据以研究农村武装斗争问题。1928年8月，毛泽东深入福建上杭、永定两县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土地革命。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掌握当时农村的商业问题、富农问题，对江西寻乌县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阶级阶层关系、土地革命以及其他社会结构和文化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撰写了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同年10月，他又对兴国县的8个农户以及该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周密的考察，为当时制定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了依据。11月，他对吉水县的东塘等四个农村进行了调查，并有著述。1933年11月，毛泽东由瑞金出发，到江西省兴国县的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的才溪乡调查，并撰写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两篇著名报告，对农村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且，对此前所做的兴国调查中未深入了解的乡村文化问题，

作了细致的考察，具体地涉及了乡村的教育、俱乐部、卫生等事项。

长征胜利完成后，我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阶段，一直到后来的解放战争，尽管环境险恶，战事紧迫，但毛泽东仍然十分关注乡村问题的调查研究。1941年3月，延安出版了他的《农村调查》一书，旨在推动广大干部对调查研究的重视。8月，依据他的倡议，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要对社会进行周密而系统的调查，尤为具体地提示了农村调查的意义和方法。1942年12月，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考察，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1945年12月，他明确指示东北局，要求“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1947年8月和12月，毛泽东在转战途中还两次到农民中调查乡村情况。1948年，他又多次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就农村的经济问题、政策问题、文化教育问题进行调查，并在工作部署上把“乡村情况调查”作为重要事项予以安排，为尔后大规模实行土地改革积累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依据。

建国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毛泽东对农村的调查重点也转到了改革和建设方面。其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1955年、1958年和1961年的实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及后来调整农村政策、制定《农业六十条(草案)》的关键阶段，每一次大的调查研究，都伴随着对乡村改革和建设的一次大的推进。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情况及其在社会改革的各个重要时期所出现的变化，自始至终是非常关注的。他从青年时期多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出发而自觉地走向革命；又从对农村情况和农民革命的多次考察中，获得了正确指导革命的主动权；同样，他还是基于对农村的了解，才领导了合作化运动，领导了社会主义改革，才自觉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许多重大失误，才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乡村的建设克服了许多困难，出现了发展较为顺利的局面。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者那里，深入了解